



顾问◎李亦园 乔健 吕志辉
主编◎徐杰舜 吕志辉

人类学与黄土文明

RENLEIXUEYUHUANGTUWENMING

行 龙 徐杰舜◎主编

【人类学高级论坛2014卷】

ADVANCED FORUM OF ANTHROPOLOGY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顾问◎李亦园 乔 健 吕志辉

主 编◎徐杰舜 吕志辉

人类学与黄土文明

RENLEIXUEYUHUANGTUWENMING

行 龙 徐杰舜◎主 编

韦小鹏 胡英泽◎副主编

人类学高级论坛(2014卷)

ADVANCED FORUM OF ANTHROPOLOGY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与黄土文明 / 行龙, 徐杰舜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207 - 10365 - 9

I. ①人... II. ①行... ②徐... III. ①黄土高原—文
化史—研究 IV. ①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608 号

责任编辑: 朱佳新

装帧设计: 鲲鹏

人类学与黄土文明

行 龙 徐杰舜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6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365 - 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人类学高级论坛/总序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人类已经跨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 21 世纪,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宗旨是:

1. 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是举世公认的,其相关历史文献的丰富也是举世无双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做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民族志描述,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时候,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做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一次洗礼。

2. 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

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人类学必须走向人民、走向社会,而不应该走进书斋、走进象牙塔。而走向人民、走向社会就是走进田野进行调查。当前在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迅速转型为人类学提供了最大最丰富的田野研究园地。中国人类学家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空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展开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出不愧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 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类学大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人类学学派。

本着这样的宗旨,由中国海峡两岸 20 家有影响的人类学研究机构 and 机关单位发起设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每年或隔年举行一次。每次论坛的演讲、发言和论文结集后由决心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坚信,在“人类学高级论坛”这个舞台上,将演出一幕又一幕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大戏”。

徐杰舜

2002 年 7 月 20 日

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

目 录

会议文件

- 003 乔 健 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贺信
004 吕志辉 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贺信

论坛特稿

- 007 行 龙 基层农村档案发现记
022 行 龙 中心尊“二乔”
027 横山广子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居民参与——以日本富田林寺内町建筑群为例

人类学视野下的黄土文明

- 039 周大鸣 李陶红 资源与地方社会——以“水”为中心的洪山社会变迁
071 徐新建 源神后土 溥博人文——以介休为例的黄土文明研究
086 彭兆荣 黄土文明之“介休范例”的民族志表述
099 安介生 “禁火”“改火”与历史时期寒食节风俗之演变
120 徐杰舜 莫 荃 山西人：黄土文明创造者的一个样本
138 罗彩娟 始祖信仰与文化溯源：作为文化源头的黄土文明
148 李 菲 黄土文明地方信仰的历史结构与文化认同：介休张壁村个案考察
162 徐嘉鸿 黄土高坡托起的圣仪——陕北左村祖先祭仪变迁
176 赵巧艳 大地之居：窑洞的栖居模式解读

黄土文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 187 赵旭东 从文野之别到圆融共通——三种文明互动形式下中国人类学的使命
209 叶舒宪 西玉东输雁门关——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报告

- 228 祁建民 四社五村水利秩序与礼治秩序
 239 张继莹 降雨与灌溉:明清山西旱作的农业时序
 256 邱仲麟 明清的山陕乐户——兼及两京教坊与诸王富乐院
 298 马丹丹 北齐文明考——邯郸、临漳、磁县考察

黄土高原与文化变迁

- 315 徐黎丽 李姝睿 黄土高原南部山区村庄 60 年土地流转研究——以 HL 庄为例
 326 苏泽龙 “农业技术”: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基于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探讨
 332 胡英译 黄河泛滥、河道变迁与农地制度技术策略——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黄河滩地历史文献为中心
 345 周兴茂 中华文化区系与黄土文化变迁
 354 郭永平 晋商村落的权威与依附——以介休市大靳村为考察对象
 365 马维强 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反行为”研究——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黄土高原与地域文化

- 379 刘冰清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山西人人文特征简论
 386 王柏中 黄土文明一题:后土神的历史演变及域外变化
 393 张俊峰 神明与祖先:台骀信仰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构
 407 姜建国 介休的村落及村落地名研究
 418 李 嘎 大小有别:共时性视角下介休聚落规模差异性研究——基于 1924 年村落人口资料的讨论
 434 孙九霞 黄土文化地区的旅游新型城镇化
 443 何 菊 并接与混融:李提摩太筹建山西大学堂的人类学检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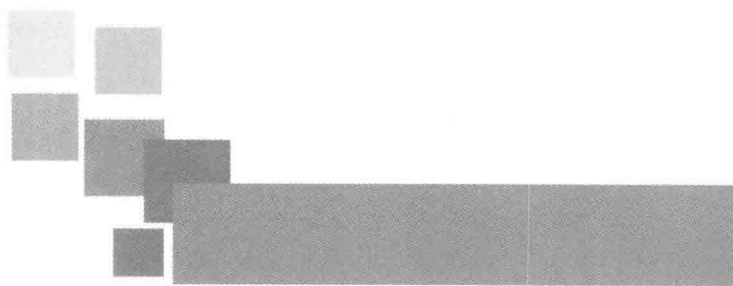
乔健从事人类学研究 60 周年

- 453 佛 子 乔健先生简介
 455 李 菲 乔健著作目录
 464 李亦园 乔健: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
 474 张小军 漂泊中的永恒:一个人类学家的理想国——纪念乔健先生八十寿辰

- 480 范可 漂泊者的返乡之旅
- 485 吴天泰 人类学家与原住民民族学院的课程发展——乔健的贡献

媒体报道

- 493 赵巧艳 推动区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 496 赵巧艳 乔健：漂泊脚步与永恒追求



会议文件



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贺信

贺信

乔健

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订于秋高气爽的九月尾在三晋古都太原市举行。主题除讨论“人类学与黄土文明”外，还有“乔健与中国人类学”及“乔健从事人类学研究60周年座谈会”等专题。一方面是对我故土的眷恋；一方面是对我本身的嘉勉。实在令人铭感五内！我对这会有无限期许，一早已买定全家的机票，准备“闖行”前往。无奈一直困扰我的心肺衰竭，突然加剧，以致两腿虚弱酸痛，无法成行，最后只好取消前往。派小堂乔立代表参加。谨此深向大会及各位老朋友新朋鞠躬致歉，祝大会圆满圆满成功，各位朋友身体健康，旅途愉快！

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贺信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代表：

太原的金秋山河壮美、春华秋实。

在这收获的季节，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古朴厚重的山西大学召开，请允许我以桂林金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及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的名义，对这次论坛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

人类学高级论坛自成立以来，在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先生的关照和支持下，在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十几年的关怀和推动下，已运作了十几个年头，获得了海峡两岸人类学界广泛的认同。

今天，在古老的太原举行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之时，我们高兴地看到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乔健口述史》在李菲博士的大力努力下，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刘大伟社长的鼎力支持下已正式出版，这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给乔健先生八十大寿献上的一份厚礼。

2014年，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教授、贵州省人类学学会会长杨志强教授和秘书长王小梅的全力支持下，7月在贵阳成功地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人类学青年论坛，海峡两岸人类学后继有人，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人类学界交流新的一页。

2014年，人类学高级论坛与山西介休市人民政府合作，在学术委员会主席乔健先生的领导下，“黄土文明课题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14年，还按时出版了第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论文集《人类学与江河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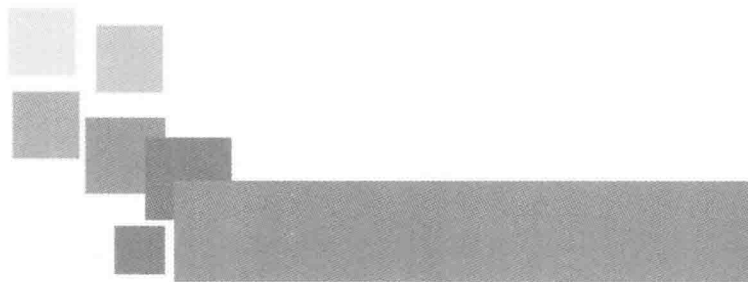
2014年，在山西大学的积极策划和组织下，第三期人类学高级论坛“讲习堂”如期举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4位学者做了精彩的学术讲演。

上述种种活动都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秋天田野的收获，使我一次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学高级论坛前进的脉搏。

衷心感谢山西大学为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召开所做的一切工作！祝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满成功！

吕志辉

2014年9月27日



论坛特稿



基层农村档案发现记

行 龙

一、“回归傅斯年”

2012 年岁末,受台湾中研院谢国兴先生之邀请,我第三次来中研院进行学术访问。此次访问除参加由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举办的“十字路口的明清研究”座谈会为“规定动作”外,其余时间均属“自选动作”了。“朝读易一卦,时钞史数行”,如此闲适的学术之旅不仅使人感到摆脱喧嚣日常后的放松,而且似乎体味到了那种信马由缰思绪飞扬的内中自由。随谢先生一起去台南考察民俗,到位于台北市中心的诚品书店购书,再去台大及台大周围数不清的小书店看看,再就是在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近代史所图书馆和档案馆查资料看书了。

位于台北南港区的“中央研究院”精致秀丽,山色青青,其优美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每每为学人津津乐道,这为我闲适的心情平添了一份优美。

然而,有一件事在此次来台之前就有过“预设”,这就是一定要再去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和“傅斯年图书馆”去感受,感受他们的精神和风范,感受他们的治学环境和生活环境,甚或是感受他们的滴滴点点。

即如胡适先生的为人一样,掩映在树木之间的“胡适纪念馆”朴素而内敛,绿藤缠绕、白墙蓝窗,给人一种静谧而优雅的感觉。1958 年至 1962 年胡适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室内的陈设依其生前的式样布置,赭红色书柜、卡其布沙发、茶几上的烟缸、阳台上的老式躺椅、书房里泛黄的书籍,还有陈列室中的著作、手稿、信札、遗物等,睹物思人,仿佛房子的主人仍在人间,或许他刚刚出去上班? 散步?

离开纪念馆之前,我又特意买了一套印制精美的胡适手迹明信片。置身主人的故居,揣摩着主人清秀的字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顿感胡适先生的这句名言蕴含着千钧之力。

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距胡适纪念馆咫尺之遥,据说当年胡适先生因有回归台湾之意,就曾致信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李济,希望为其在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方,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便安心读书写作。从胡适纪念馆步行到傅斯年图书馆,不免使人想到两位亦师亦友的牵连。1950 年 11 月,年仅 55 岁的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 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

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①

据云,傅斯年死后,胡适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他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傅斯年也承认这一点。从风靡一时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到傅斯年的“你们都不配骂胡适之”,胡、傅友谊可见一斑。我在这里想到的是,胡、傅的学术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从胡适的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我们自然会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

从台北回到太原,回到自己工作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鉴知楼,我即有了为中心师生讨论访台感受的冲动。2013年1月12日,一个周末的上午,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PPT,以“回归傅斯年:‘动手动脚找东西’”为题,在鉴知楼内向中心师生汇报访台感受。

傅斯年,这位曾经受毛泽东接见,又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极少数人”,他是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又是《新潮》杂志的创办人;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更是“史料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因两次抨击两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赢得“傅大炮”称号,又因绰号“傅大炮”的“质询”而猝死在台大校长任上。斯人已去,毁之誉之对他而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傅斯年的遗绪何在?

“史学便是史料学”,现代的历史学需要“集众的工作”。傅斯年不仅为此鼓之呼之,而且身体力行、乐此不疲。自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直到1950年辞世,傅斯年终身任职史语所所长。据云,自1928年中研院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史语所是中研院13个所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研究机构。从精心网罗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这样的著名学者,到指导甚至“严格监督”青年学者们的研究方式;从擘画史语所前景自撰《旨趣》,到躬身田野考察前往考古发掘现场;从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争取研究经费,到心急如焚无微不至地解救病中的梁思永;从广州、北平、上海、南京、长沙、昆明,到四川李庄的板栗坳,再迁南京,后到台北……这就是那个“最能做学问”,“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才领袖人物”(胡适语)傅斯年。

傅斯年精心经营的史语所,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集众的工作”,正是这种“集众的工作”使史语所产生了一大批专业历史学家、历史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正是这种“集众的工作”使史语所产生了一大批轰动于世的学术成就:语言组曾划分出中国语言分布图,也曾派遣团队调查各地方言,并以语音记号记录了14个省份的数百种方言;考古组发掘了分布于8个省区的55处遗址,持续九年的安阳发掘震惊中外。中国考古学前辈苏秉琦指出:只有在安阳发掘之后,历史学家们才敢于将商朝作为一个真正被证实了的朝代,放在他们著作的开篇;人类学组在东北,尤其是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多项田野调查;历史组最重要的工作则是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950年12月20日条。转引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第268页。

明清内阁档案的收集与整理,而这一工作“可以说明老一代与新一代学者史料眼光之不同”。^①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却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故事。我们知道,自明代设军机处后,内阁成为主要处理文档的机构。1908年,自明至清堆积成山的内阁档案从大库移到走廊上,大学士张之洞决定将档案从大库转移到学部,同时建议将书籍搬出保存,并将剩余档案材料烧毁。时为张之洞属下的学部官员罗振玉“亟言于文襄,谓是皆重要史料,不当毁弃”,张遂改变主意,建议将这些档案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1911年的辛亥革命迫使档案搬家,次年档案移至历史博物馆。从那时起,包括时任部长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内的许多官员都曾光顾过这座“小山”式的纸堆,但他们大多沉溺于在纸堆中寻找珍贵罕见的宋版书,在他们看来,除宋版书外,这些材料既无价值也不入眼。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预算赤字竟然将150吨的纸张作为废纸卖给了造纸厂!又是这位罗振玉得知此消息后,出了三倍的价钱买下了这批资料,并挑选出版了其中的一些档案。事有连续和奇巧,又是这位罗振玉,他也因为个人财政困难把档案卖给古物收藏家李盛铎,李盛铎的心思也在其中的宋版书,他也因负担沉重打算再卖给日本人或哈佛燕京学社。最后,还是傅斯年获得资金购买了这批档案。在这买来买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语所同仁与清代学者迥异不同的史料观。像傅增湘、李盛铎这样的藏书家和古物收藏家,他们关心的只是宋版书,而傅斯年则认为,宋版书对史语所毫无价值,陈寅恪说得更为直接明了:“我辈史语所人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②

“我以为宝”之大批档案到手后,傅斯年发动并指导大批人力对此进行分类整理,其中,由李光涛挑选、编辑并出版了100卷档案。至今,这项编辑出版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数量已达300多卷。于此相联系的另一项工作是,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居然发现了几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失踪了的一千多页原版的《熹宗实录》(1621—1627)。由此促使傅斯年着手另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即校勘和整理《明实录》,这个计划一直持续了四十年,结果是出版了154卷《明实录》。是的,如果没有这些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我们今天读到的众多明史著述不知会缺失几多,甚又谬舛几多。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六家三体源远流长,那么,近现代的中国史学则是众派林立迭有翻新。按照许冠三先生的分类,自梁任公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就有所谓的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五大学派,而傅斯年、陈寅恪则是史料学派的代表。^③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主流的“史料学派”被长期阻隔甚至遭到无情的批判,台北的傅斯年也好,广州的陈寅恪也好,同样淡出人们的视野甚或被遗忘,即使年轻一代的知识人,对他们的思想和成就也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才开始反思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

①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2页。

② 1929年3月10日陈寅恪寄给傅斯年的信,转引自王汎森前揭书,第103~104页。

③ 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